

纵横家之兴考辨

熊 宪 光

战国时代，“天下方务于合从连横”^①，纵横家顺时而兴，应时而盛。他们或奔走游说，驰骋辩才；或入朝干政，出谋划策，活跃于当时政治、外交舞台之上。他们“一怒而诸侯惧，安居而天下熄”^②，在当时左右政局，声威显赫。刘向《校战国策书录》所谓“苏秦为从，张仪为横；横则秦帝，从则楚王；所在国重，所去国轻”，就充分肯定了他们在当时举足轻重的政治作用。

然而在《汉书·艺文志》所谓“九流十家”中，“纵横”是不太显眼的一家；而在先秦诸子中，“纵横”也没有取得如“儒”、“墨”那样号称“显学”的地位。到了汉武帝“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”之后，纵横家更被视为异端；作为“纵横家言”的《战国策》，也被后世儒者斥为“邪说”^③；因而对于纵横家的研究，历来薄弱，有许多问题尚待认真探讨。本文拟对纵横家之兴这一问题作一番追本探源似的考辨，意在“辨章学术，考镜源流”。

一、“出于行人之官”辨

关于纵横家之兴，前人论述中最具权威性的观点见于班固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：

从横家者流，盖出于行人之官。孔子曰：“诵《诗》三百，使于四方，不能专对，虽多亦奚以为？”又曰：“使乎，使乎！”言其当权事制宜，受命而不受辞，此其所长

也。及邪人为之，则上诈谖而弃其信。

应该指出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是以刘歆《七略》为蓝本的，所以这一段论述，实出刘歆。西汉末成帝时，刘向奉诏校书，“每一书已，向辄条其篇目，撮其旨意，录而奏之。”刘向卒，刘歆奉哀帝之命继承父业，“于是总群书而奏其《七略》”^④。所谓“七略”，包括“六艺略”、“诸子略”、“诗赋略”、“兵书略”、“数术略”、“方技略”和“辑略”。“略”即界域、类别，“七略”中，“辑略”之外的“六略”是书的六种类别，“辑略”则是各类通论的汇集。颜师古注说：“辑，与集同，谓诸书之总要。”因为刘歆注重学术系统，要揭示学术的源流与发展、长短和得失，所以在“六略”之前，作一通论，汇集起来，便是“辑略”。这应该说是刘歆的独创。班固作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，删取“辑略”原文为各类书的总序和各种书的小序，所以我们在《汉志》中仅见“六略”，而未见“辑略”，实则“辑略”已化为总序和小序了。

所谓“从横家者流，盖出于行人之官”的断语，即见于“诸子略”著录的“纵横家”之小序中。引人注目的是，“诸子略”提出了诸子皆出于王官的观点，如说儒家出于“司徒之官”，道家出于“史官”，阴阳家出于“羲和之官”，法家出于“理官”，名家出于“礼官”，墨家出于“清庙之官”^⑤，杂家出于“议官”，农家出于“农稷之官”，就连被排除于“可观者”之外的小家，也指其“出于稗官”。总之，都与王官攀上了关系。关于诸子学术源头的这一论断，可以肯定是出于刘歆《七略》，因为在《七略》之前，现存的四篇论及诸子流派的重要文章，即《庄子·天下》、《荀子·非十二子》、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所载司马谈《论六家要指》和《淮南子·要略》，都不曾讲诸子出于王官。刘歆首倡此说，是有其特殊意图的。

刘歆是汉代影响很大的今古文之争的挑起者。他倡言尊经而

崇尚古文经，“欲建立《左氏春秋》及《毛诗》、《逸礼》、《古文尚书》皆列于学官”，曾受哀帝令与五经博士辩论，写下著名的《移让太常博士书》，抨击当时经师（太常博士）“因陋就寡，分文析字，烦言碎辞，……信口说而背传记，是末师而非往古”，乃是“保残守缺，挟恐见破之私意，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；或怀妒嫉，不考情实，雷同相从，随声是非”^⑥。刘歆极力鼓吹尊崇古文经，其中以抬高《周官》的地位和主张立《左传》于学官二事，关系最为重大。他之所以倡言古代学术无不出于王官，以证明《周官》确是周公（姬旦）的著作，目的显然是为了抬高《周官》亦即《周礼》的地位。其意图在于说明：诸子出于周官，周官出于六艺，六艺出于圣人，借以强调古文经的权威性。这样看来，所谓古代学术皆出王官之说，显然并非全都可信。

不过，刘歆之说也有某些可取之处。如他说“从横家者流，盖出于行人之官”，便看到了“从横家”与“行人之官”存在着某种联系。所谓“行人之官”，乃职掌朝覲聘问之事，周官有“大行人”，“掌大宾之礼，及大客之仪，以亲诸侯”；有“小行人”，“掌邦国宾客之礼籍，以待四方之使者”^⑦。列国也有“行人之官”，当春秋时，往来聘问，奔走各国的“行人”，甚为活跃，其职略近于今之外交使者。所以刘歆接着引述孔子“使于四方”及“使乎，使乎”之说，认为其所长在于“权事制宜，受命而不受辞”。纵横家重视外交活动，那正是他们驰骋辩智的疆场。他们中的大多数也确实是在外交舞台上大显身手的说客策士。从活动的方式和履行的职能来看，纵横家与所谓“行人之官”，确有某些相类似之处。从这个意义说来，称纵横家“出于行人之官”，肯定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传承关系，不是没有理由的。只是这一论断，忽略了纵横家之兴与战国乱世特定历史条件的不可分割关系，未能揭示出本质的因素，不免片面和拘

泥。

比较而言，《淮南子·要略》论及纵横家之兴，似更通达一些：

晚世之时，六国诸侯，谿异谷列，水绝山隔，各自治其境内，守其分地，握其权柄，擅其政令。下无方伯，上无天子，力征争权，胜者为右。恃连与国，约重致剖信符，结远援以守其国家，持其社稷，故纵横脩（按：“脩”即“长”，

淮南王刘安避其父刘长讳改）短生焉。

这一段论述，从战国时代的地理形势、政治特点、战争状况、外交活动等诸方面的特征着眼，揭示出“纵横长短”乃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，较之“出于行人之官”的缘起说切实得多。当然，这是从社会、政治和历史的观点立论的，如果从学术的观点看来，则有所不足。纵横家虽然兴起于战国纵横之世，但它并非无源之水、无本之木，探究其学术渊源，还是有迹可寻的。

二、“纵横家之祖”考

《史记·苏秦列传》开篇就说：“苏秦者，东周洛阳人也。东事师于齐，而习之于鬼谷先生。”裴驷《集解》引徐广曰：“颍川阳城有鬼谷，盖是其所居，因为号。”又引《风俗通义》说：“鬼谷先生，六国时从横家。”《史记·张仪列传》开篇也说：“张仪者，魏人也。始尝与苏秦俱事鬼谷先生，学术，苏秦自以不及张仪。”根据这些记载，后人便将“鬼谷先生”奉为“纵横家之祖师”。又有《鬼谷子》一书，也被称为“真从横家之祖也”^⑧。“纵横家之祖”究竟是谁？这个问题有必要一考。

先说“鬼谷先生”。

所谓“鬼谷先生”，不知何许人也，历来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在《史记》的记载中，他是苏秦和张仪共同师事的纵横家；及至后世，大概由于“鬼谷”之名本身即给人以神秘奇幻、莫测

高深的感觉吧，竟愈传愈奇，什么兵法家、神仙家、命相家的头衔，都一一封颁给他。后世之说，固为无稽之谈，可勿置论，值得注意的是汉人之说。扬雄《法言·渊骞篇》说：

或问：“仪、秦学乎鬼谷术，而习乎纵横言，安中国者各十馀年，是夫？”曰：“诈人也！圣人恶诸。”

王充《论衡·答佞篇》说：

问曰：“佞人直以高才洪知考正世人乎？将有师学检也？”

曰：“佞人自有知以诈人，及其说人主，须术以动上，……术则从横，师则鬼谷也。传曰：苏秦、张仪从横习之鬼谷先生，掘地为坑，曰：‘下，说令我泣出，则耐（通“能”）分人君之地。’苏秦下，说鬼谷先生泣下沾襟。张仪不若。

《论衡·明雱篇》又说：

苏秦、张仪悲说坑中，鬼谷先生泣下沾襟。

上述汉人之说，均称“鬼谷先生”为苏、张纵横之师，其说当有所据。《论衡·答佞篇》引述所谓“传曰”之语，可见“鬼谷先生”事迹别有所载，惜乎其未能指明出自何“传”，且资料亡佚，无从考索。但从所谓“术则从横，师则鬼谷也”之说，可知习纵横术者皆奉“鬼谷”为师。关于“鬼谷先生”的情况，在现存的先秦两汉载籍中，除上述者外，别无所见，因而是一团谜。

然而汉代以后，关于“鬼谷先生”的记载则续有所见。《文选》卷二十一载晋代郭璞《游仙诗》有云：

青谿千馀仞，中有一道士。云生梁栋间，风出窗户里。

借问此何谁？云是鬼谷子。

唐代李善注说：

《鬼谷子序》曰：周时有豪士，隐于鬼谷者，自号鬼谷子，言其自远也。然鬼谷之名，隐者通号也。

既称“鬼谷子”为周时“豪士”，又说是“隐者通号”，可见已

是一位虚化了的人物。这里有必要说一说“鬼谷”。“鬼谷”为地名，向无异议，但究指何处，则各说不一。《史记·苏秦列传》司马贞《索隐》曰：“鬼谷，地名也。扶风池阳、颍川阳城并有鬼谷墟，盖是其所居，因为号。”又，《史记·樗里子甘茂列传》记苏代说秦王迎甘茂，语及“自殽塞及至鬼谷”和“使彼来则置之鬼谷”。张守节《正义》引刘伯庄说：“此鬼谷，关内云阳，非阳城者也。”又案：“阳城鬼谷时属韩，秦不得言置之。”可见“鬼谷”其地，说法不同，亦难确指。“鬼谷”又作“归谷”，“归”与“鬼”，一声之转。《尔雅》曰：“鬼之为言归也。”在东晋王嘉《拾遗记》中，即称张仪、苏秦二人游学，“逢归谷子”，归谷子“教以干世俗之辩”，又授以“韦帙三卷书”，“仪、秦学之以终身”，其描叙颇带神奇色彩。而在梁元帝萧绎《金楼子·箴戒篇》中，“鬼谷先生”被描写成以长生之术授秦始皇的非凡人物，明显地染上了仙气。到了后蜀杜光庭《录异记》的描叙中，就干脆封之为“古之真仙”了。这些离奇诡诞的虚幻之说，显系后人杜撰，不足为据。

关于“鬼谷先生”的姓名和时代，也有一些不同的说法。南宋郑樵《通志·艺文略》引晋代皇甫谧说：“鬼谷先生，楚人也，生于周世，隐居鬼谷。”唐代马总《意林》卷二录“《鬼谷子》五卷，乐氏注，名壹”，马总按：“其序云：周时有豪士隐者，居鬼谷，自号鬼谷先生。无乡里族姓名字，此苏秦作书记之也。鬼之言远，犹司马相如假无是公云尔。”《史记·苏秦列传》司马贞《索隐》亦引乐壹注《鬼谷子》书称，“苏秦欲神秘其道，故假名鬼谷”。至于明代李杰《道藏目录》则谓：“鬼谷先生，晋平公时人，姓王名诩，不知何许人，受道于老君。”

类似的稀奇古怪说法还有不少，勿烦列举。即便是以上所引见于汉代的资料，也未必可信，遑论后世那些荒诞无稽之说了。司马迁在《史记·苏秦列传》中早已指出：“世言苏秦多异，异

时事有类之者，皆附之苏秦。”可见苏秦其人其事，在汉初已混淆不清，所以《史记》所载苏秦生平事迹，真伪杂糅，不可尽信。如说苏秦与张仪“俱事鬼谷先生”，后世的传奇之说即大都由此生出；又认定苏秦是与张仪同时对立的人物，说苏死于张前，因而生发种种误说。实际上，据马王堆汉墓帛书《战国纵横家书》的可靠资料，张仪是与公孙衍、陈轸同时敌对的人物，苏秦的年辈要比张仪晚得多。帛书《苏秦谓陈轸章》记苏秦游说陈轸，自称其名“秦”，而尊称陈轸为“公”，谓“今者秦立于门”，“愿有谒于公”，可见当时苏秦还是一个不知名的年轻游说者。其时据考为公元前312年，张仪早已相秦、相魏、相楚，名闻诸侯，再过两年之后，张仪就死了^⑨。由此可证，所谓苏、张同时师从“鬼谷先生”学习纵横术之说，是根本站不住脚的。

现在看来，“鬼谷先生”确实极富传奇色彩和神秘意味。诸多扑朔迷离的说法其实大多出于附会、揣测或虚构。就目前所能见到的资料而言，所谓“鬼谷先生”很可能只是子虚乌有似的影子人物，很难说历史上实有其人。

既如此，要说“鬼谷先生”是纵横家的祖师，便是虚妄不实了。

再说《鬼谷子》一书。

考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，未曾著录《鬼谷子》。虽然乐壹等指称《鬼谷子》即《苏子》，但班固在著录“《苏子》三十一篇”下仅注“名秦，有《列传》”，对所谓《鬼谷子》则只字未提。《苏子》已佚，而从《后汉书·王符传》注及《太平御览》所引《苏子》佚文看来，其文与《鬼谷子》不类，故尚无理由说《鬼谷子》便是苏秦书。

《鬼谷子》一书，始见著录于《隋书·经籍志·纵横家》，其后即屡见史志及书目著录。旧有乐壹、皇甫谧、陶弘景、尹知章等四家注，今传者为南朝齐梁之际陶弘景注本，凡三卷，共二十

一篇。

考刘向《说苑·善说篇》引《鬼谷子》曰：

人之不善而能矫之者，难矣。说之不行，言之不从者，其辨之不明也。既明而不行者，持之不固也。既固而不行者，未中其心之所善也。辨之明之，持之固之，又中其人之所善，其言神而珍，白而分，能入于人之心，如此而说不行者，天下未尝闻也。

此段引文，为今本所不载。又，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说：

有法无法，因时为业；有度无度，因物与合。故曰：

“圣人不朽，时变是守。虚者道之常也，因者君之纲也。”

司马贞《索隐》道：

“故曰圣人不朽”至“因者君之纲”，此出《鬼谷子》，

迂引之以成其章，故称“故曰”也。

考今本《鬼谷子》，亦无此段文字，但《索隐》言之凿凿，必有所据。此外，《文选》注及《太平御览》、《意林》诸书所引数条《鬼谷子》文，或为今本所不载，或与今本所载颇有差异，可知今本已非旧本原来面目。其实，对于《鬼谷子》一书，向来多有疑其为后人伪作者。如唐代柳宗元《辩鬼谷子》说：

《鬼谷子》要为无取。汉时刘向、班固录书，无《鬼谷子》。《鬼谷子》后出，而险整（li，乖戾）峭薄。恐其妄言乱世，难信，学者宜其不道。而世之言纵横者，时葆其书。尤者，晚乃益出七术，怪谬异甚，不可考校。其言益奇，而道益狭。使人狙狂失守，而易于陷坠。幸矣，人之葆之者少。

明代宋濂、胡应麟皆赞同柳宗元之说。杨慎也在《四部正讹》中断言：“《鬼谷子》，《汉志》绝无其书，文体亦不类战国。晋皇甫谧序传之。……盖东汉人本二书（按：指《汉志》所录《苏子》、《张子》）之言，会萃附益为此；或即谧手所成而托名“鬼谷”，若子虚、亡是云耳。”清代姚际恒则在《古今伪书

考》中认定《鬼谷子》“其人本无考，况其书乎！是六朝所托无疑”。

他们的怀疑虽不无道理，但既然司马迁文及刘向《说苑》等已引《鬼谷子》，则汉初已有此书，尚无充分证据说明它一定是“东汉”或“六朝”时人所伪托。从今本《鬼谷子》看来，也还不能说它是“险整峭薄”、“怪谬异甚”、“浅而陋矣”。联系战国时代及秦汉之际纵横家的游说实践来看，此书更像是纵横之术的经验总结、理论概括和系统阐述。因此，与其说《鬼谷子》是“纵横家之祖”，毋宁说它是一部纵横家的学术理论结晶。至于其作者为谁，难以确考，但可肯定是纵横家或研习纵横术者之流；如果以今人为文之署笔名视之，也不妨称之为“鬼谷子”或“鬼谷先生”。但它不是指某一个人，而是作为纵横者流的化名或代称。考虑到“纵横长短之术”当战乱的秦汉之际还颇时兴，直至汉初，犹有习者^⑩，可以推断《鬼谷子》的最初成书，大约在战国末年至汉初之间。

综上所述，“鬼谷先生”及《鬼谷子》书都不具备“纵横家之祖”的资格，那么，寻根讨源，可推谁为“纵横家之祖”呢？

从现有资料看来，最有资格居此位的，当数春秋时期鼎鼎大名的子贡。

子贡是孔子著名弟子之一，姓端木，名赐，字子贡，卫人，少孔子三十一岁（前520—？）。在孔门“德行”、“言语”、“政事”、“文学”四科中，子贡是“言语”科中的翘楚^⑪。他长期随侍孔子，“利口巧辞”，长于辞令，富有外交才能，被孔子誉为堪当大任的“瑚璉”之器^⑫。

作为儒家祖师的孔子，是非常看重外交和辩说才能的。他把“行己有耻，使于四方，不辱君命”看作可以称“士”的标志^⑬；提出“言之无文，行而不远”^⑭；欲进庶人于朝，故称“不学《诗》，无以言”^⑮；而他教弟子诵《诗》，又以“使于四方”

而“能专对”为贵^⑩。在他的弟子群中，子贡正是这样的佼佼者。

孔子本人对辩说也是很有研究的。《韩诗外传》卷五第二十二章就有孔子关于“谈说之术”的精辟论述，虽然是否确出孔子之口，尚难断定，但孔门既设“言语”一科，则以此施教的孔子对“谈说之术”研究有素，应是毋庸置疑的。

然而真能领会“谈说之术”的精髓，并运用于外交、游说实践，使之发扬光大的人物，乃是子贡。在孔子看来，惟子贡堪称“辩士”。《韩诗外传》卷七第二十五章记“孔子游于景山之上”，命子路、子贡、颜渊各“言其愿”。子贡说：

两国构难，壮士列阵，尘埃涨天。赐不持一尺之兵，一斗之粮，解两国之难。用赐者存，不用赐者亡。

孔子即赞之曰：“辩士哉！”真是无独有偶，同书卷九第十五章又记“孔子与子路、子贡、颜渊游于戎山之上”，命“二三子各言尔志”。子贡说：

得素衣缟冠，使于两国之间，不持尺寸之兵，升斗之粮，使两国相亲如兄弟。

孔子又赞之曰：“辩士哉！”

值得注意的是，后来的纵横家就往往被称为“辩士”。如《战国策·齐策三》说：“今苏秦，天下之辩士也，世与少有。”陈轸也被称为“天下之辩士”。蔡泽“使人宣言以感怒应侯（范雎）”，也声称：“燕客蔡泽，天下骏雄弘辩之士也。”^⑪那时候，“辩士”几乎成了“纵横家”的别称。而在历史上被称为“辩士”的人，似乎没有比子贡更早的了。不仅如此，上引子贡之言，还被后来的纵横家所崇奉。试看《战国策·秦策一》所记对纵横家苏秦的赞颂之辞：

故苏秦相于赵而关不通。……不费斗粮，未烦一兵，未战一士，未绝一弦，未折一矢，诸侯相亲，贤于兄弟。
对照子贡之言，可谓如出一辙；或者不如说，子贡自言之“志”，

被后来的纵横家所继承，并且按《战国策》作者所论，竟是一一兑现了。

这样看来，说子贡是“纵横家之祖”，应是可信的了。

然而更能说明这一问题的，还是“子贡一出，存鲁、乱齐，破吴，强晋而霸越；子贡一使，使势相破，十年之中，五国各有变”的游说实践活动。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载其事迹，与后来苏秦的游说活动颇相类似；其游说之辞，也极似后来的纵横家言。试看数例。

其一，《列传》记曰：

子贡南见吴王，说曰：“……且夫救鲁，显名也；伐齐，大利也。……名存亡鲁，实困强齐，智者不疑也。”

《战国策·齐策二》记秦攻赵长平，齐、楚救之。赵无以食，请粟于齐，而齐不听。苏秦游说齐王曰：

夫救赵，高义也；却秦兵，显名也。义救亡赵，威却强秦兵，不务为此，而务爱粟，则为国计者过矣。

两相比较，可见吐辞命意均极相似。

其二，《列传》记子贡使越说越王：

子贡曰：“……且夫无报人之志而令人疑之，拙也；有报人之志，使人知之，殆也；事未发而先闻，危也。三者举事之大患。”

与此类似的说辞，也见于《战国策·燕策一》所载苏代北见燕王哙的游说之辞：

夫无谋人之心，而令人疑之，殆；有谋人之心，而令人知之，拙；谋未发而闻于外，则危。

可见战国纵横家拾取了春秋“辩士”子贡的牙慧。

其三，《列传》又记子贡曰：

吴王为人猛暴，群臣不堪；国家敝以数战，士卒弗忍；百姓怨上，大臣内变。……今王诚发士卒佐之以徼其志，重

宝以说其心，卑辞以尊其礼，其伐齐必也。

《战国策·燕策一》载苏代之说曰：

今夫齐王，长主也，而自用也。南攻楚五年，穡（蓄）积散。西困秦三年，民憔悴，士罢弊。……其民力竭也，……数战则民劳，久师则兵弊。……

夫骄主必不好计，而亡国之臣贪于财。王诚能毋爱宠子、母弟以为质，宝珠玉帛以事其左右，……则齐可亡已。不难看出，纵横家苏代对燕王哙的游说，用计遣辞都与子贡之说越王勾践颇相类似。上述事例充分说明，春秋“辩士”子贡实开纵横家的先河。他的行事和言辞，为纵横家所崇奉、师法，演其馀绪而发扬光大，在战国时代焕发出特异的光彩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汉人对此似乎早有较为明确的认识。刘向《说苑·善说篇》便将子贡与鬼谷子、主父偃相提并论，特引述其说云：

子贡曰：“出言陈辞，身之得失，国之安危也。《诗》云：‘辞之绎矣，民之莫矣。’夫辞者，人之所以自通也。鬼谷子、主父偃都是汉人公认的著名纵横家，特将子贡置于其间，引述其“出言陈辞”之论，足证在汉人的心目中，他们同属一流。

此外，扬雄《法言·渊骞篇》尚有如下记述：

曰：“孔子读而仪、秦行，何如也？”

曰：“甚矣！凤鸣而鸷翰也。”

“然则子贡不为欤？”

曰：“乱而不解，子贡耻诸。说而不富贵，仪、秦耻诸。”

在这一段问答中，虽然作者是以大儒的身分褒子贡而贬仪、秦，但从问语中不难看出，当时赞赏纵横家者亦不乏其人；而在这些人心目中，子贡无疑是“孔子读而仪、秦行”的典型代表。这就

意味着，汉人早就把子贡看作纵横家的先行者了。

综上所述，我们有理由认为，子贡作为“纵横家之祖”，是当之无愧的。

三、来于各家，自成一派

虽然早在春秋之时，子贡已开“纵横”之端，但“纵横家”作为一个学术流派，则是兴起于战国之世。“纵横”在战国汇为学派之一流，其由来多源，非止一端。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《文史通义·诗教上》中指出：

九流之学，承官曲于六典，虽或原于《书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，其质多本于礼教，为其体之有所该也。及其出而用世，必兼纵横，所以文其质也。古之文质合于一，至战国而各具之质。当其用也，必兼纵横之辞以文之，周衰文弊之效也。故曰：战国者，纵横之世也。

章氏主要从“诸家本于六艺”的观点出发，论述“九流之学”，“其质多本于礼教”，而其文则“多出于诗教”。因为诸子争鸣，都要“文其言以达旨”，所以“必兼纵横之辞以文之”。虽然章氏着重讲的是“战国之文”和“纵横之辞”，但他明确指出诸子“出而用世，必兼纵横”的特点，无异于指明了“纵横”出于各家这一事实。郭预衡先生在《儒家流为纵横说》中更明确指出：“战国之初，有儒家之纵横，有墨家之纵横，换言之，亦即纵横家有出于儒者，有出于墨者，流别昭然，显而易见。考纵横家之源流，不可不知也。”^⑧

除了时代因素和社会历史背景等原因而外，纵横家之兴当然也和学术自身的发展、演变、分化及重新组合密切相关。《韩非子·显学》说：

世之显学，儒、墨也。儒之所至，孔丘也。墨之所至，墨翟也。……孔、墨之后，儒分为八，墨离为三，取舍相反

不同。

在这样的演变过程中，儒、墨阵营中的一些人，受时代精神的感召，“出而用世”，流为“纵横”，便是自然而然的了。

号称“显学”的儒、墨两家如此，其他各家也不例外。即便是当时儒、墨、法、兵各家代表人物，如孟轲、荀卿、墨翟、韩非、吴起之流，都无不兼有鲜明的“纵横”色彩，也无不讲究游说之术。如孟轲，虽然他攻击“处士横议”，斥责“为机变之巧者，无所用耻焉”，还曾讥讽当时名震天下的纵横家公孙衍、张仪为“妾妇之道”；但他自己也以“知言”自许，并且以“好辩”著名。不仅如此，他还身体力行，“后车数十乘，从者数百人，以传食于诸侯”^⑨，积极从事游说活动，只是被当时各诸侯国的统治者认为不合时宜，因而不受信用罢了。《战国策·燕策一》中甚至记有孟子劝齐伐燕的游说，讲的是“今伐燕，此文、武之时，不可失也”，与纵横家言几无二致。尽管后世儒者认为这有损“亚圣”的形象，一口咬定“圣贤决无是事”（见鲍彪注语）；但参以《孟子·公孙丑下》所记，透过孟子的诡辩，可见其“劝齐伐燕”是否认不了的事实。《战国策》之所记，反倒是可信的。孟子尚且有“纵横”习气，所谓“八儒”之徒，当战国纵横之世而不流于“纵横”者，恐怕不多。

再如孟子之后的大儒荀卿，本身虽无纵横之行，但其作《荀子·非相》中却有“谈说之术”的论析，精要而透辟，可为“纵横之法”，堪称“游说之经”。难怪《说苑·善说》开章明义即录引其论，并将他与鬼谷子、子贡、苏秦和汉代纵横大家主父偃、蒯通等相提并论，足见其“纵横”色彩之浓。

又如韩非子，身为著名的法家集大成人物，曾著《五蠹》痛斥“从衡之党”，并将“言谈者”列为“五蠹”之一，建议“人主”除之。但他也深受“纵横”之气的熏染，对游说之术非常重视。《韩非子》中有《说难》、《说林》及《内储说》、《外储

说》等篇章，实际上都不外乎是游说之术的研习和说资的准备。

至于兵家代表人物吴起，据《战国策》中所记，其言行带有鲜明的“纵横”特征。纵横家与兵家在用计施谋、诡诈机变方面原本就有不少共通之处，出现在《战国策》作者笔下的兵家代表人物，显得更富于“纵横”气，是不足为怪的。

此外，从《鬼谷子》一书所载纵横之术看来，其中分明杂有一些道家学说，可见纵横家与道家也不无瓜葛。

总之，当时各家的头面人物，为了“出而用事”，都不能不习“纵横”，无怪乎“纵横”为一时之盛。在这种情势下，一批专门致力于奔走游说、出谋划策的辩士、策士从各家中脱颖而出，如异军突起，独树一帜，自成一派，于是就出现了所谓“纵横家”。

四、“三晋多权变之士”

论纵横家之兴，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不容忽视，那就是区域文化现象。先秦诸子学派的产生，显示出一定地域特征，十分引人注目。如邹、鲁乃儒、墨之邦，南方为道家之乡，燕、齐出阴阳家者流，纵横家则多出自三晋。司马迁以史家的锐敏眼光，对此早有认识。他在《史记·张仪列传》的论赞中特别指出：

三晋多权变之士。夫言从衡强秦者，大抵皆三晋之人也。

事实也正如此。以当时著名的纵横家而论，张仪为“魏人”，犀首（公孙衍）为“魏之阴晋人”，范雎为“魏人”，姚贾为“梁（魏）监门子”，“游说之士”虞卿为“赵上卿”，楼缓为“赵人”。苏秦兄弟为东周洛阳人，而战国时的东周是公元前367年在赵、韩武力支持下，从小国西周分裂而出的另一小国，若论地理位置，正居于韩、赵、魏之间。所以从区域文化角度着眼，苏秦兄弟也应被看作“三晋”之士。

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“纵横家之祖”子贡乃是春秋时“卫人”，而卫国于公元前254年为魏所灭，故就地域而言，仍属“三晋”范围。这就意味着，“三晋”堪称纵横家的“祖籍”。

“权变之士”即“纵横家”多出于三晋之地，说明纵横家之兴与地域条件多少有些关系。所谓地域条件，并非单指山川、地形、气候、物产之类自然条件，更包括历史形成的人文环境的诸多因素，如该地区特定的历史沿革、民族关系、人口迁徙、教育状况、风俗民情、方音方言等等。由于自然条件和人文因素的差异，使区域文化呈现出质态各异特征。战国时代“三晋多权变之士”的社会现象，无疑反映了三晋文化特征的一个层面。

我国古代识见卓越的史学家和文论家如司马迁、班固、刘勰等，早已对区域文化各具特点有所认识和论述。如班固在《汉书·地理志》中就曾指出：

凡民函五常（按：指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）之性，而其刚柔缓急，音声不同，系水土之风气，故谓之风；好恶取舍，动静亡常，随君上之情欲，故谓之俗。

本着这一认识，他在《地理志》中不仅概述各地区的分野、辖境、山川、道路、物产、户口，而且特别重视人文因素，着重“条其风俗”。如对三晋之地，便有如下一些论述：

（晋）文公后十六世为韩、魏、赵所灭，三家皆自立为诸侯，是为三晋。……

周地，……今之河南洛阳、谷成、平阴、偃师、巩、缑氏，是其分也。……周人之失，巧伪趋利，贵财贱义，富高下贫，憙为商贾，不好仕宦。……

（韩）其俗夸奢，上气力，好商贾渔猎，藏匿难制御也。……

赵、中山地薄人众，犹有沙丘纣淫乱馀民。丈夫相聚游戏，悲歌忼慨，起则椎剽掘冢，作奸巧，多弄物，为倡优。

.....

太原、上党又多晋公族子孙，以诈力相倾，矜夸功名。

.....

以上关于风俗民情的简要概述，正是从区域文化的角度，鲜明地揭示了三晋之地人文因素的某些突出特点。了解这些因素，对于惯弄诡诈计谋、善于机巧权变之士何以多出自三晋之地这一独特的社会现象，也就更容易理解了。

近代学者刘师培从区域文化的角度，论述我国古代南北文风之不同，对于纵横家之兴这一问题，也有所涉及。他在《南北文学不同论》中指出：

春秋以降，诸子并兴。……故河北、关西，无复纵横之士。韩、魏、陈、宋，地界南北之间，故苏、张之横放（原注：苏秦为东周人，张仪为魏人。），韩非之宕跌（原注：非为韩人。），起于其间。

又说：

纵横之文，亦起于南（原注：陈轸、黄歇之流是也），故士生其间，喜腾口说，甚至操两可之说，设无穷之词，以诡辩相高。

刘氏重在论文，却也指出了“纵横”之兴的区域文化特征，堪称有识之见。

毫无疑问，纵横家作为“九流十家”之一，勃然兴起于战国之世，有其复杂而深刻的原因，区域文化的因素只是其中之一，并且纵横之士也非完全出自某一特定地域。然而指出这一特点，对于我们深入研讨纵横家的方方面面，无疑是有所裨益的。

注

①《史记·孟子荀卿列传》。

②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。

③曾巩《战国策目录序》。

④《汉书·艺文志》序。

⑤原作“清庙之守”。余嘉锡《四库提要辨证》说，“守”字为“官”字之误。

⑥见《汉书·楚元王传》附《刘歆传》。

⑦《周礼·秋官》。

⑧秦恩复《鬼谷子叙》。

⑨参见帛书《战国纵横家书》附录唐兰《司马迁所没有见过的珍贵史料》、《苏秦事迹简表》。文物出版社，1979年版。

⑩《史记·田儋列传》说：“蒯通者，善为长短说，论战国之权变，为八十一首。”《主父偃传》说：偃“学长短纵横之术”。《张汤传》说：“边通，学长短。”又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诸子略纵横家类著录《蒯子》五篇，《邹阳》七篇，《主父偃》二十八篇。

⑪《论语·先进》：“德行：颜渊、闵子骞、冉伯牛、仲弓。言语：宰我、子贡。政事：冉有、季路。文学：子游、子夏。”

⑫见《论语·公冶长》。瑚琏为宗庙重器，喻堪当大任的人才。

⑬⑭见《论语·子路》。

⑮见《左传·襄公二十五年》。

⑯见《论语·季氏》。

⑰见《战国策·秦策一》和《秦策三》。

⑱载北京《经世日报》“读书周刊”，1947年7月30日、8月6日。

⑲分别见《孟子·尽心上》和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

（本文责任编辑：耿素丽）